

我在沿河城三年的地下斗争

王树瑞

1941年1月，平西区党组织派我到沿河城日本警务段为日本指导官当“拨役”。让我以这个身份搜集敌人的情报，配合我平西抗日游击战争。直到1943年11月杀死日本清水小队队长、火烧警务段，前后近三年时间。这是我参加革命的开始，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但是党的教育、培养、信任和严肃的斗争考验，却使我终生难忘。现在，我做一简要的回顾。

“一郎”

1940年冬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门头沟的沿河城。沿河城地处丰沙铁路线的中上段，离北京(当时叫北平)八十公里，是进攻我平西根据地，掠夺我平西矿产资源的交通要道。

日本进城后，又筑碉堡又建警察所、维持会。为了讨伐平西游击队和掠夺矿产资源，保证铁路运输安全，他们还设立了警务段。警务段里有十多个日本指导官和三个中队伪军，约四百左右人，他们叫满铁队。

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区，领导平西人民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。1941年1月，我方获悉：警务段要让维持会给他们找几个小孩到那里当“拨役”。有一天，我大哥王树芳从山上打柴回来告诉我：“老韩、老王让你回家去一趟，他们在大核桃树底下等你有事。”我问他什么事，他说，到那儿就知道了。我知道大哥是地下交通，不该他说的话他一字也不说。

我走出家门，心里盘算：“一定是有重要的事，不然为什么他们俩人找我呢。”老韩叫韩晓照，他是我宛平县敌工部的干部，老王叫王学强，他是区公安员。我大哥常给他们送情报，我跟他们也很熟。

我的家原住在沿河口，离沿河城三里地。日本占了沿河城以后，害怕游击队袭击，敌人实行大并乡，就把五里三村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住，我家也被赶进城，就住在离警务段第三道铁丝网大门不远的地方。老百姓上山打柴、回老家背粮拿菜才许可出城。我哥哥就是借上山打柴和游击队接头。

我进了沿河口村，远望大核桃树底下一个人也没有。等我走到树底下的时候，王学强同志在地堰下边等着我呢。他说，“给你寻个吃饭的地方。”他知道我从小没父母，生活很苦，才这么说。我问他上哪儿，他说给日本人当“拨役”去。我不明当“拨役”是怎么回事，他说就是给日本人当使唤人。我一听就急了，我说：“伺候日本人，我饿死都不去。”他笑着对我说：“拨役是你公开身份，你的任务是搜集日本鬼子的情报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你要好好的伺候他们，挨打挨骂都不能跑回来。”我这才明白，这是交给我的任务。我问他：“我才十三岁，干得了吗？”他说：“人家要的是小孩，大人还不要呢，我们看你成，才让你去的。”最后他告诉：“你的代号是101，以后有情报写在纸条上可不能写你的名字，要写101，记住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记住了。”

几天以后，维持会就把我领到警务段，让我伺候日本小队队长石山和清水两个人。他们给我起了一个日本人的“名字”，叫“一郎”。

扑空

才到警务段，我不熟悉伺候日本人的事，时常挨打。要是由着我的性儿，早就不干他妈的了。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任务，眼泪咽到肚子里，把满腔怒火压下去。有一回，清水小队长说我没有把他的碗洗干净，把我叫去，不由分说，大嘴巴一个挨一个的抽我，我的脸和嘴立刻就肿起来了，最后一脚把我踢进屋里去。我实在忍受不了，就跑回家去，见到我哥哥、嫂嫂就伤心地哭起来，告诉我大哥，我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了，让王学强换人吧。我大哥看我被打得这个样子，也很难受。他找到王学强同志一说，老王说：“回来可不成，打不死就得去。你告诉你弟弟说，记住日本鬼子的仇恨，咱们打他的日子在后头呢。”后来，三个日本兵也出来找我，我才又回去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慢慢地学会了怎样伺候他们，挨打的时候也少了，我跟他们也混熟了。因为我每天要给他们打扫卫生、做饭、买菜，所以我可以随便出入石山、清水的住屋和警务段的大门。

1941年4月一天，交通员王树芳和索振斌找我，说王学强同志让我到沿河口去一趟。我到那里，老王交给我一项任务：让我搞一份满铁队的花名册。我知道花名册就在石山的保险柜里，钥匙就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，可是因为我的文化低，就是拿出花名册，一时半会儿我也抄不完，那是很危险的。后来我等石山到北京休假去了，在清水队长晚上洗澡的功夫，我走进石山的办公室，打开保险柜，取出了花名册，让通讯员索振斌按照约好的地点把花名册交给了王学强同志，他们抄好了又让王树芳给我送回来。

1942年夏天，有一天晚上天阴得很沉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天气闷热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忽地起了一阵风，跟着霹雷闪电，瓢泼大雨下起来了。我一看没什么事了，就躺下睡觉了。没想到，半夜石山把我叫起来，说让我给他们做饭。我心想：“半夜三更还下着这么大的雨，一定是有什么急事。”我正在淘米，石山把翻译官找来，他俩叽哩呱啦地说，我也听不明白，只听见有“游击队……沿河口”六个字。我一捉摸沿河口一定是有什么情况。我急忙把米下到锅里，顶着倾盆大雨，爬过三道铁丝网，一口气跑到我的家，告诉我大哥王树芳，要马上通知王学强同志，今天夜里敌人有行动。

凌晨三点钟，日本兵和满铁队冒雨出发了。没想到天刚大亮，他们就回来了，只见大雨把他们淋的跟小鸡子一样。我见石山满脸怒气，就赶忙给他打洗脸水、换衣服。他发疯地嚎叫“他妈的，什么情报，统统是假的！”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，倒在椅子上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多亏我及时送出了情报，那天夜里王学强等人正在沿河口开会，他们接到情报立刻转移到山上，敌人包围了沿河口，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，结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。那次情报是王树芳、黄恩博两个人用大绳把索振斌、李集云从城墙上送下去，为争取时间抄近道送给王学强的。

刀放在了脖子上

沿河城的日本鬼子，常遭到我平西游击队的打击，他们越来越胆小，就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。为了增强防卫，他们又在离沿河城十五里的楼岭山上，增驻了一个伪军小分队，这个小分队的任务是封锁我根据地各村的联系。

为了打击敌人，韩晓照同志让我摸清楼岭伪军的活动情况。我通过满铁队的人，了解到楼岭小分队有三十多人，每个月要换一次防。在换防时，他们要带的是一个月的粮食、弹药。粮食、弹药都由民夫担驮，伪军在后边押送。有一次换防，我事先摸清了他们的换防时间、行动路线，而且了解到这次是由满铁队的刘队长护送。然后我把情报交索振斌送给王学强同志。到了那天，我游击队埋伏在通往楼岭的王乐口村附近。当伪军和民夫走入埋伏圈后，我军突然发起攻击，民夫一听枪响都跑了。刘队长挂了花，伪军一看队长挂花都四散逃跑了。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，缴获了敌人一个月的粮食、弹药。

满铁队的伪军，都是咱中国人。不少人是被迫当兵的。为了争取他们便于开展工作，我有时偷点日本人的饼干、罐头给他们吃。有一个姓杨的小个子，我叫他小杨。他老家是昌平县人，有个老娘跟他在沿河城住，生活很困难，我也常搞点吃的给他老娘吃。

日本指导官里，有个叫佐藤的，他管弹药库和食品库。他常让我帮他打扫库房搬子弹，在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就偷些子弹，然后再送到交通索振斌那里，由他再转给游击队。我偷的子弹，装在一双日本人的白袜子里，然后扎在我的裤腰里。我送出的时候，都在日本人还没起床的时候。没想到，日子长了，佐藤

对我有了怀疑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又在日本兵没起床的时候出去送子弹，一出大门没走多远，就看见佐藤在半路上等着我呢。他问我上哪去，我说给石山买菜去。他问我腰里鼓鼓的是什么，他上前一把拉住我，从腰里把两枚筒子弹掏了出来。他把我拉到院子里，问我是不是给八路送去，我一口咬定：“不是，我是给满铁队的小杨子送的。”因为我过去跟小杨子偷过，所以我才敢这么说。佐藤问：“为什么给他偷？”我说：“小杨子说他的子弹不够用。”佐藤说：“你说谎！”只见他“刷”地抽出了大马刀，一手揪住我的耳朵，把刀就放在了我的脖子上。他喊道：“不说实话就死啦死啦的有！”他听我还是不改口，就收回了马刀，派人把小杨子找来。小杨子一看这阵势就吓坏了。佐藤问他：“这子弹是不是给你偷的？”小杨子说：“我的子弹不够，他给我偷过。”佐藤把小杨子我们俩，一人打了几个嘴巴，这码事就算完了。这回要不是小杨子一句话，我的脑袋就掉了。

攻心战

为了瓦解敌人的斗志，我华北地区把日本战俘组成一个“反战同盟会”。让他们写思念家乡、怀念亲人的宣传品，然后散发到日本军队里去。

有一次，王学强同志让我把宣传品带到日本指导官那里去。我就利用每天到火烟楼那里给日本人取矿泉水的机会，让他们把宣传品送到火烟楼等我。有一大卷，外边包装得还挺好看。我气喘呼呼地扛回来交给石山小队队长说：“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，我在小泉子那里拣的。”鬼子知道我不识字，所以他们并不怀疑我。石山看了“哈哈”大笑，他把那些东西又卷起来。后来运到北京去了。象这样的宣传品，我带进去好几次。听日本人说，那里有些是讲日本人怎样过樱花节的。这是个日本全国性的大节，每到这天，全家都要团聚欢庆。日本兵看了宣传品，自然就会怀念亲人，思念家乡，不愿在中国打仗。我叫它“攻心战”，后来我也想方设法的做这方面的工作。

有一次，清水小队队长喝了酒高兴，让我给他唱歌。我说我不敢唱；他问为什么，我说那都是八路唱的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唱给我听听。”我就大胆地给他唱：“五月的鲜花”、“芦沟桥小调”，还有一个小调，歌词是我们游击队编的，是唤起日本兵思念家人团聚的，有几句词我还记得：“家住东洋三岛上，爹娘、父老都在高堂，幼弟十五妹十二，最可悲——新婚三月好梦征程……”后来不但清水让我唱，日本兵也让我唱。那时候，我也学会了几句日语，一边唱还比比划划的解释歌词的大意。有个长得傻里傻气的日本兵，我叫他“傻柱子”，他是管弹药的，经常挨打。他越挨打，我越接近他，给他唱歌，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跟他混得很熟。后来我就给他做工作。我说：“他们竟打你，你到中国来做什么？还不如逃跑呢。”他说他不敢跑，因为家里还有父母、妻子呢。我就利用和他的关系，多次打着伪军的牌子向他要点子弹、药品，然后再给游击队送去。有时候为了拉关系，也要点饼干、罐头送给满铁队伪军吃。

我们搞“攻心战”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制造日本鬼子和伪军的矛盾，对日本鬼子和伪军区别对待。当时我华北战区有个口号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放下武器不杀”，就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的。那次日本鬼子包围沿河口扑了空，就总想袭击我游击队驻地。有一次，我听说他们要到西大台村清剿我游击队，我就及时地送出了情报。我游击队埋伏在西大台村外的两个山腰上。

日本鬼子有个孙翻译，是个东北人，这小子抢男霸女无恶不作，沿河城内就有十几个妇女被他奸污。他也穿着日本鬼子的黄军装，伪军穿的是绿军装。这天他们出发还跟往常一样，让伪军在前头，鬼子在后边。上午七、八点钟，进入了埋伏圈，我游击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，真是“兵从天降”，敌人一下子乱了阵，火力集中打击穿黄衣服的日本鬼子，十几个鬼子被打死了七、八个，那个汉奸孙翻译也当场被击毙。沿河城的老百姓，听说这个坏蛋被打死了可高兴了。都说游击队给群众除了一大害。说来也巧，这次满铁队的伪军一个也没伤亡。吃饭的时候我听他们议论：“八路军的子弹都长眼了，专打穿黄衣服的鬼子，不打咱中国人，往后咱可不能作恶。”这次对伪军教育不小，一直到1943年11月我们消灭日本指导官，打死清水小队队长时，他们都没出兵支援鬼子。

拔钉子

我平西游击队先后派进警务段的还有师长敏、李继云，他俩在满铁队工作；还有一个小刘（我忘了他的

名字)，他在日本兵营房里工作。我们当时都是十多岁的孩子。晚上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常凑在一块玩，日本人也不介意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还搞点鬼子的香肠、罐头、香烟，晚上在一块以打麻将牌为名，互相谈谈个人知道的情况。然后就把这些情况汇总起来写成情报，交给在城里活动的交通员索振斌、王树芳、黄恩博、韩志兰等人送给游击队。

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，1943年10月底，我平西游击队提出要消灭指导官，拔掉警务段这个钉子。王学强同志和我接了头，让我首先摸清敌人的情况。我借帮佐藤清扫弹药库的机会，查清了库房里有十一万多发子弹，几支手枪，几支步枪，一挺轻机枪，一个掷弹筒。我从满铁队那里了解到小杨在11月5日夜值班，我还了解到11月3日有一部分鬼子回北京休假。我就根据这三点情况写了情报，交给王树芳送给王学强同志。过些日子我接到王学强同志指示：行动日期定在11月5日夜12点，让我设法把鬼子灌醉，打开大门，接应游击队。

11月3日，石山队长和一部分鬼子回北京休息去了，院内只有清水小队队长、佐藤、小松、山口、大成等几个人了。每当石山一回北京，剩下的鬼子就散漫自由了。到了五日这天鬼子悠闲无事。下午我就跟管烧洗澡水的索振斌说：“今天早点烧洗澡水，让他们痛痛快快的洗洗。”水烧好了，我就请清水他们洗澡。我就在这个工夫到他们的屋里，把他们的手枪、大枪、子弹都给锁在他们自己的箱子里，手枪套还挂在墙上。如果他们发现，我就说：“你们都洗澡去了，院里我一个人怕出事。”做完了这事，我又马上把早已准备的酒菜摆满了清水的办公桌。几个鬼子洗完澡肚子也空了，我就顺势把他们让进清水的屋里。他们大吃大喝起来。喝过了一个时辰，就有一个鬼子支持不住了。我就把他扶上床让他睡下，其余几个也喝得东倒西歪了，我就把麻将牌拿来让他们打牌。我说：“今天晚上，你们就痛痛快快地打吧，我去给你们放哨站岗，保险太平无事。”他们大喊大笑的打牌，我就出去了。我先把四架修电话的梯子顺到围墙外两架，墙里立上两架。我为什么要立梯子呢？因为警务段是个方圆半里多的大院，院墙有二丈多高，墙外有三道铁丝网。指导官的日本鬼子住在院的南头，北边住着满铁队的伪军，还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大岗楼叫大板仓，里边住着一班日本鬼子，南北相距有半里远。我们的游击队如果走正道，进了大门还要往北走，绕个大弯经过两、三个岗楼才能到指导官的宿舍。这样很容易被敌人发现。如果进了大门就翻墙过来，下墙就是鬼子的宿舍了，这样又安全又快。

时间不早了，我心里很不踏实，生怕情况有变化。为了探听动静，我到伙房里拿了一块羊肉，借口给家送肉，到大门的岗楼里向小杨要出了钥匙，小杨子还说：“回头给我弄点吃。”我说：“那还不好办。”我打开三道大门，出去一看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我的心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往上提，简直要跳出了嗓子眼儿了。

我回来的时候，三道大门都没上锁，我告小杨子说：“我一会儿还有事要出去，门没锁，省得再开了。”我又回到南屋，见清水他们打得正欢，我又给他们添了添灯油，拨了拨灯。

我第二次出大门时，走出第三道铁丝网没几步，就看见两个人影，站在头里的那个人问我：“你是黄家的外甥吗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那人又说：“那你也是我的外甥，我是李文华。”我大舅黄国珠、表兄黄恩普都是我宛平县的干部，我听他们说过李文华是游击队长。我叫了他一声“大舅”。他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再等我一下，我得先和大门岗楼的小杨子说好。”站在李队长身后还有一个膀大腰圆的大个子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我急速地回到岗楼对小杨子说：“小杨子，游击队杀指导官来了，我也要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他一听八路军要来，有点害怕，他说：“我有心跟你走，可是我的老娘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那也好，今天是来杀鬼子的，碍不着你的事，只要你不打枪，也不杀你也不逮你。”他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明白。”说完，我就跑出去，领着李队长、大个子他们，一共五个人爬梯子上墙，从墙上直接就登上了清水他们打牌的南屋。又从南屋顺墙头上了东屋，从房顶上看清了四个鬼子打牌的情况。就在这时，不知谁登下来一块瓦，“叭”的一声落在了地上。我看见小松警觉地大喊：“谁呀！”、“谁呀！”只见李队长和那个大个子紧跟着扔出去两颗手榴弹，大个子又顺手打了一梭子枪，屋里的灯立刻灭了，鬼子乱作一团，只听见他们在大连铺上“通通”地跑，我知道他们是找枪呢，心里好笑。我跟李队长说：“放心吧，他们的枪和子弹都让我给锁上了。”随后我们六个人都从房上跳下来，我溜进西屋，急中生智，拿起字纸篓，倒上煤油，点着了猛地向南屋一扔。我们也随着火光冲进去。这时清水也看清了我，他瞪起两只血眼，“呀！”的一声，向我冲过来，声嘶力竭地喊：“一郎，你的心大大地坏了坏了的！”我们俩扭打起来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那个“大个子”一个箭步上来，拦腰抱住了清水，我抽身出来，拿起“大个子”的大山镰刀，拼命地照着清水的大肚子砍去，还有的拿手榴弹砸他的脑袋，几下子就结果了他的狗命！字纸篓的余光，照见床下有两双脚，拉出来一看是

小松，也让我用大山镰刀砍死了。没有一袋烟的功夫，五个鬼子就上西天了。

埋伏在外边的游击队和五百多民夫，听到枪响也顺梯子涌进来，抢走了枪支弹药，在日本洋人服务社当会计的李青云也把库房打开，把食盐、香烟让大家抢走。大伙用山镐从岗楼的枪眼开了一个大洞，大队人马就从这里撤离了。我点一把火，把鬼子的信鸽房，库房都点着了，火光照亮了游击队和群众前进的道路。

这次警务段的伪军没有动，大板仓的一班鬼子也只打枪，没敢出来。在拂晓前，我们安全到达了根据地——王大台子的外曹子村。天亮以后，我们开了庆功大会。韩晓照和王学强同志也参加了大会。会上县游击队政委谭林同志把我高高的举起来，夸我是中华的好儿女，任务完成的很好。韩晓照、王学强也表扬我这次任务计划得好，完成得好。我跟韩晓照同志说：“多亏游击队里的那个“大个子”，要不是他手急眼快劲头大，我就得死在清水手里，”韩晓照说：“他的外号叫‘干得了’，也跟你一样是个从小没父母的穷小子，他也是拓峪村的人……”可惜的是，我忘记了他的名字，从那以后我就没见到过他，可是‘干得了’却永远记在我心里。

继续战斗

随着沿河城战斗的胜利，我被党派入警务段为日本鬼子当“拨役”的任务也就结束了，做为“101”我的历史使命也胜利完成了。我随游击从来到了根据地，在那里受了两个多月的训：因为我当时才十五岁，不便于参加游击队打仗，王学强同志就让我继续做沿河城的敌工工作。

后来日本鬼子又重建了警务段，他们把我哥哥王树芳逮去打了一百多棍子，问我跑到哪儿去了，我哥哥也没说。为了控制我哥哥，鬼子把他留在警务段挑水。我因为暴露了身份，不能直接出面活动了。在1944年3、4月，王学强找了两个人，帮我在包家坟的南山上挖了一个洞，让我在那里隐蔽。那里是个深山老林，没有人去，条件十分艰苦。吃粮靠我嫂子送，吃水要到十里以外的山泉子提。有时吃的接不上了，就找些野菜野果子吃。我哥哥借回家吃饭的机会把日本鬼子的情况告诉我嫂子说，我嫂子借给我送粮的机会再告诉我说，我再转给王学强同志。那时王学强住在离我十五里远的东柜山上。就这样我坚持了一年多。日本投降以前，驻守在沿河城的日本鬼子被迫撤离了。1946年4月，经王学强同志介绍，平郊武工队队长王秀川把我调到昌宛七区武工队任敌工委员，为解放全中国，我又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，经受了锻炼。解放北京时，我被调到补训团当指导员训练俘虏，一直到全国解放。

（《房山文史资料》第3辑）